

辛亥首义精神及其核心

◆王功安 陈奇文

“武兴”。这是吴玉章先生在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一文中“序诗”的名句。这两句诗，既指出了武昌首义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也赞扬了武昌首义对推翻清王朝、结束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伟大历史功绩。

我们认为，武昌首义不仅揭开了辛亥革命胜利的序幕，给清朝封建统治以致命的一击，导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而且还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就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革命精神，简称辛亥首义精神。其主要内容是：

一、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一是打响了第一枪。1911 年 10 月 10 日傍晚，武昌城南新军工程八营营房首先发难，起义士兵 40 余人，在革命党人熊秉坤的率领下，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反清的第一枪。这一枪给清朝封建统治以致命的一击，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在全国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推向了新的高潮。革命党人、起义士兵和群众，只用了差不多 3 天的时间，不仅在武昌黄鹤楼楼顶高高飘起一面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还使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全部“光复”；到 11 月下旬，全国 24 个省(区)中有 15 省脱离清政府，响应武昌首义而独立，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二是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武昌起义的直接成果是湖北军政府的创立。1911 年 10 月 11 日，取得了起义胜利的革命党人，凭着对同盟会宗旨的信仰和首创精神，在武昌阅马场咨议局

大楼，经民主协商议决，成立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前，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它出告示，安民心、稳定社会；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起义；组织、领导抗击清军反扑的武汉保卫战。在短短的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政活动。它还废除了清宣统年号，代之以黄帝纪元(1911 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确立了革命军军旗为十八星旗。在中国近代史上结束了帝制，开启了共和政体。

三是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鄂州约法》。《鄂州约法》的制定与颁行，一反盛行几千年的君权神授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开创了以宪法形式塑造国家形象的先河。《鄂州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构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政权。它不仅成为各省仿效的范例，而且成了中国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文件，成为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前身。

这“三个第一”，是当时湖北革命党人、参加起义的士兵和群众集体智慧和集体实践的结晶，是大智大勇的时代产物，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集中表现。

二、敢于斗争的献身精神

武昌首义从 1911 年初起义前的准备至 11 月 28 日汉阳失守，不到一年的时间，革命发展出现了种种挫折，经受了起义前、起义中和起义胜利后的三次严峻的考验。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准备武昌起义的考验。在当时严峻形势下，湖北革命党人并没有后退半步，他们决心斗争下去，以大无畏精神，变“响应”为“首

义”，以进击的姿态准备在武昌起义。5 月 3 日，同盟会的居正和共进会的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在胭脂巷 24 号共进会机关紧急开会，决定以武昌新军为主力准备起义，同时决定和文学社实行联合。7 月 26 日，《大江报》发表了为革命推波助澜的文章，把矛头直指清廷，触怒了敌人，《大江报》被查封，报馆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但革命党人还是无所畏惧，不断突破敌人的严密监视和防范，紧张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

第二次是首义刚拉开序幕就遇上孙武配制炸药失事、三烈士遇难的考验。9 月 24 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召开联合大会，通过了起义计划，决定了起义时间，拉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10 月 9 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配制炸药时，不慎失事，孙武受伤，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所有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袖章、名册、信件和室内物品均被搜洗一空，大批起义领导人员被捕。当晚，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惨遭杀害。

在革命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一不怕死、二不怕挫，明知有牺牲，坚持用牺牲换来起义胜利。他们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清廷用铁血相拼的时候；与其坐而待捕，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发动起义”^①10 月 10 日晚 7 时，工程八营开始点名，反动排长陶启胜带两名护兵在营房检查，走到金兆龙房中查铺，见金与几个士兵荷枪实弹卧在床上，陶启胜上前去抢夺金兆龙的枪。金见起义之事败露就高呼：“同志们，动手！”程正瀛闻声举枪就射，陶启胜带伤出逃，此时工程八营内枪声大作。共进会在工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集合队伍，与金兆龙

率队直奔楚望台。与这里的守军会师控制了军械库。武昌城内各处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听到枪声后,也纷纷起义,接连奔赴楚望后。然后,在吴兆麟临时总指挥的率领下,对清总督署发动了三次猛烈进攻,至11日上午武昌起义取得胜利,随后两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

第三次是迎接阳夏决战,保卫首义胜利成果的考验。10月10日深夜,湖广总督瑞澂逃出后,连夜向清廷电告武昌起义消息,请求朝廷派大军前来“剿办”;同时急电河南、湖南巡抚求援,就近弹压。清廷接到瑞澂的奏报,大为震怒,派陆军大臣荫昌带领北洋军第二镇、第四镇一部沿京汉线南下,又派水师提督萨镇冰率海军13艘舰艇控制汉口江面,对革命军进行反扑。

当时军政府刚刚成立,兵力不足5000人,面对这一场更为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将士们勇敢地保卫首义胜利成果。革命军迅速扩军备战,5天之内就招募到3万名新兵。10月18日,清军向汉口刘家庙发起进攻,正式拉开了“阳(汉阳)夏(汉口)战争”的序幕。在英勇无比的革命军面前,清军遭到迎头痛击,刘家庙首战告捷,毙伤清军千余名。由于清军水陆增援,又配有先进的远程炮和马克沁机枪,分三路围攻,刘家庙落入敌手。血战10日,革命军伤亡惨重,统领谢元恺、敢死队队长马荣不幸阵亡。红十字会的医生描述当时战场见闻说:“民军勇往直前,誓死不回”,“受枪伤后,忍痛前进,不肯就医”。可见革命军视死如归之英雄气概。

阳夏战争是辛亥武昌首义胜利后的一场著名的保卫战,历时41天,革命军牺牲人数逾万,其中无名者多达4300人。这场战争,虽然汉口、汉阳都失陷了,但是这次战争和英烈们的功绩是不朽的,正如辛亥革命志士张难先所说:“有此万余人之头颅,支持武昌根据地两月,使各省胆气雄壮,次第反正”,从而推翻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则此万余名英雄之功绩^②。不仅如此,他们用生命铸成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也是不朽的。

三、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晚清,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登峰造极。在慈禧垂帘听政统治中国的近半个世纪里,她独揽大权、一手遮天,陷中国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渊。1911年的辛亥武昌首义,在中国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影响下,其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矛头直指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那么武昌首义则是起点。正是由于武昌首义的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才一举捣毁了清王朝在两湖的反动统治中心——武昌总督署,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开了共和国之先声,给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皇权的覆灭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

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又表现在《鄂州约法》的制定与颁行。《鄂州约法》一反过去盛行两千多年的“朕即国家”的皇权,赋予人民广泛的权力,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信教、迁徙、营业自由;人民还可陈情于议会,监督行政官署。总之,它载明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蓝图。从此皇权至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宣告终结,保皇立宪的君主立宪制也为人民所唾弃。

四、敢于抓机遇的果断精神

1911年10月,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及其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是革命党人敢于抓住机遇、果断发动起义的产物。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一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突出,它们正忙于准备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激烈。这就迫使它们对于中国的革命暂时难于插手,更不可能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二是清政权内部危机重重。特别是

1908年11月,晚清封建专制统治的化身——慈禧太后崩逝,大清王朝的强人统治一去不复返,不满3岁的溥仪于同年12月被抱上皇位,这种皇位虚设、皇权旁落的统治格局,隐伏着极大危机;摄政王载沣昏庸无能,不仅未能扭转小儿做皇帝的统治危机,还使晚清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统治危机更加加深。

三是全国革命形势大发展。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伏彼起。各地的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斗争不断发生,其中尤以长江流域和山东一带最为普遍。1911年,长江流域大水成灾,饥民暴动和抗捐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湖南浏阳一带和浙江杭州、宁波等地的饥民掀起了抢米斗争,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工人斗争也日趋活跃。特别是铁路风潮的发生,使革命潮流更为高涨起来。1911年4月11日,清廷下令铁路收归国有,四川绅商合共筹得商股1400万两,民股1660万两。清廷不仅不愿偿付现款,而且施加高压,再加上革命党人的支持,使得“和平争路”变成“武装争路”,进而各地骚动,发展成为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

四是湖北、武汉的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是人民群众对清朝严重不满,自发反清斗争连续不断。1908年5月,汉口因当局无偿地剥夺人民土地爆发了后湖反清斗争。1909年夏,江汉各堤溃口,六府一州遭灾。同年,长江泛滥,湖北灾区达30个县,灾民达300万。从1910年到1911年,汉阳、石首、京山、潜江、广济、天门、随县、光化等县抢米事件层出不穷,瑞澂派军镇压仍不能制止。1911年1月,咸宁爆发温朝钟领导的铁血英雄会起义,1911年初,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官吏的“吴一狗事件”。与工人、农民、市民的连绵不断反清斗争相呼应,武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浪潮。

其次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早在1904年,武汉就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1906年,日知会遭到破坏,革命运动暂时沉寂。从1907年开始,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团体又破土而出,很快就成立了近30个。这些小团体经过分

化、组合,演变成为两个革命组织,一个是文学社,由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成,蒋翊武任社长,许多社员都分布在新军中,人数达5000人之多。另一个是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是孙武,自称为同盟会的支派。当时,谭人凤受黄兴之托,携款800元到汉口和孙武、居正密谋建立机关,运动起事。因此,共进会大力加强在新军中的工作。此外,武汉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他们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哺育下,也积极行动起来从事革命活动。他们有的创办报刊,唤醒国人;有的投笔从戎,运动军队;有的组织团体,联络同志;有的致书乡人,广为发动。“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③。

上述各方面的形势,充分说明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已经形成,亡清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出现了遍及武汉社会各层面的革命氛围。在这一关键时期,是观望等待?还是果断地抓住起义机遇?湖北革命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抓住机遇,向敌人发起总攻。

五、敢于联合各个革命派别的团结奋斗精神

为了推翻清朝,革命党人敢于团结各个派别志士共同奋斗。主要形式:

一是建立革命团体内部的联合。关键是文学社、共进会的联合。这两个团体目标一致,但各有组织系统,他们的领导人认为只有联合起来,革命才能有成功的保障。经过双方研究,在刘复基、邓玉麟的斡旋之下,两大团体从争取辛亥首义胜利的大局出发,于1911年9月14日,举行联合大会,作出决定,将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搁置不用,以革命党人名义参加起义,并制定了联合起义的文告与旗帜。9月24日,又召开大会,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成立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举了革命领导人,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实现了联合和团结,为辛亥首义胜利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

二是争取团结新军将士。“新军”中的士兵和部分中、下级军官,很多都是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和受过一些资本主义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留日回国的军校学生。他们对清政府不满,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所以湖北的革命党人从革命一开始就“从运动军队入手”,并始终把新军作为最主要的争取联合的对象。办法是利用公开刊物进行革命宣传;秘密在“新军”中散发反清专刊,进行策反工作;在新军驻地设立联络点,深入清军基层进行组织团结工作。当时,清军第八镇和21混成协15,000人,纯革命党人约2000人,经过工作同情革命者4000多人,与革命为敌者不过1000余人,余者都动摇不定。因此,起义时革命军队力量无比,声势浩大。

三是把武装起义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军民团结,共同对敌。其方式是,运用报刊广泛宣传革命,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发动群众拒债、抗捐、抗税、争路等。1911年4月,革命党人詹大悲等在武汉各界代表数百人欢送汤化龙进京、筹议挽救湖广铁路借款的集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反清演讲,尖锐指出,“政府向恃专横,视人民如草芥。……如腐败政府不允人民所请,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同盟会湖北会员江元吉在武汉的一次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数千人的大会上,为动员群众起来斗争,割肉写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并在会后将十六字制成铜版遍载于全国报章。同年9月下旬,第二十九标革命党人陶勋成参加保路会开会,演说时力数清廷无道,媚外辱国,强收民股,等于抢劫,说到愤激时,自断左手食指,以表反抗决心。这些典型事例不仅对群众的斗争起到了引领作用,还对市民参与、支持武装起义,促进军民团结灭清,起到了动员和组织作用。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注重群众斗争的作用,争取把武装起义与群众公开斗争联合起来,所以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始终得到市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使武昌首义首战告捷。

以上五点是辛亥首义精神的主要内

容。归根结底,它的本质、核心和根源在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一,爱国主义是辛亥首义胜利的旗帜。湖北革命党人深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对革命的重要性,深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当时救中国的革命思想,于是他们从首义的准备开始直到每一战斗,无一不是以爱国思想来动员,使得爱国主义以及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三民主义成为参加起义士兵和群众的强大精神支柱,对武昌首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爱国主义是湖北革命党人的强大精神。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它深深植根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中。湖北志士多来自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不少人是“秀才当兵”——走投无路的小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例如1905年黄陂募兵九十六人,其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秀才。这些人不仅从小就在民间接受了爱国主义的传说和故事的熏陶,还从学校和史学遗产中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迪和教育,加上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爱国主义自然成为他们革命的强大动力。

第三,爱国主义是贯穿五大辛亥首义精神的一根红线,是五大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贯穿于五大精神之中,使每一种精神都充满着爱国主义思想和豪情;它还是辛亥首义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对湖北革命党人和参加起义士兵的长期熏陶和哺育,就不会有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

正值辛亥革命97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写出一点感受与读者共同研讨。S

注释:

①何炳然:《武昌起义》,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皮明庥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③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民国35年版

(作者王功安,武汉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委统战部原部长、研究员;陈奇文,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童 叟